

东亚文明： 共振与更生

胡令远 徐静波 庞志春 主编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东亚文明：共振与更生

胡令远 徐静波 庞志春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文明:共振与更生/胡令远、徐静波、庞志春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309-10206-2

I. 东… II. ①胡…②徐…③庞… III. 中华文化-影响-文化史-日本-文集
IV. ①K313.03-53②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7074 号

东亚文明:共振与更生
胡令远 徐静波 庞志春 主编
责任编辑/黄昌朝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21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206-2/K · 460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出版资助
特此鸣谢！

丛 书 序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格局逐渐形成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审时度势，拓展思维空间，立足国情，博采众长，是使我国在不远的未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目前，世界范围内在区域性冲突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互为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战后日本崛起于亚洲和世界，成功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研究的广阔空间。基于此，我校经数年筹策，于1990年正式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另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研究，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扩大双边多领域的合作。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希望这套凝聚着中日两国学者智慧结晶的丛书，能够成为我国中日比较研究领域中的一朵奇葩。

在《日本研究丛书》出版之际，对给予我们这项工作以多方关照支持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中外有关朋友，谨致诚挚的谢忱。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理事长 郑励志

目 录

丛书序 郑励志(1)

东亚文明：总论·通观

我对“日本学”研究的思考 严绍璗(3)

东亚文化圈的共通性要素
——地理·人种·文字·思想和文化等诸要素的试析 张 翔(12)

东亚社会的文明基石
——汉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吕 静(21)

东亚价值观的现代探寻 郭洁敏(31)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形成过程与流派的思考 盛邦和(40)

“汉字文化圈”的构思 [日] 彭佳红(65)

东亚文明与“东亚共同体”

试论建构“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
——从历史启迪与未来追求的视角 赵建民(83)
东亚共同体建构的文化前提 艾 菁 胡令远(93)
东亚共同体的文化基盘 李广民 秦 英(103)

2 东亚文明：共振与更生

- 东亚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困境 郭冬梅(113)
“东亚共同体”与“历史认识问题”
——以中日关系为中心 洪伟民(122)

东亚文明(一)：历史·人物

-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编纂与明治前期的日本汉学家 刘雨珍(141)
从盛宣怀《东游日记》看 20 世纪的中日关系 彭 曜(154)
日记中的郑孝胥东瀛外交生涯 李振声(161)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趣味” [日] 渡边晴夫(184)

东亚文明(二)：思想·文化

古代日本汉诗的成立

- 东亚独立天子国家与汉字文化 [日] 辰巳正明(199)
《国家的品格》所论述的日本文化的实像与虚像 徐静波(212)
论韩国与日本文化机质的不同特色 潘畅和(226)
“日剧”、“韩流”与当代中国 吴咏梅(236)

东亚文明(三)：文学·语言

- 韓中夢字類小說中的夢幻與仙界描寫 [韩] 崔溶澈(253)
“《蒙求》力”广论 王晓平(264)
层次性情态论学说的形成及其局限性
——兼论尾上圭介的主语和谓语学说 徐一平(279)

日语基本形容词的语法化 黄小丽(292)

余论：东西文明之间

东西方社会变动的共时性：西学传入中国的基本前提 冯 玮(307)

英语圈中的古代东亚研究

——后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美] Jason WEBB(321)

书籍之路与东亚文明 王 勇(332)

上海的冲击

——汉译洋书从日本的传入与明治汉文的复兴 [日] 刘建辉(336)

东亚文明：总论·通观

我对“日本学”研究的思考

北京大学 严绍璗

近三十年来,与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发展同步,我国的“日本学学术”研究在学术认知、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论的许多层面中有着重大的提升。其中,“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它的业绩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国的人文学者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认知,在人文学术领域中已经从长期以来以“经验和感知”为观察与阐述的基点,进入到了“理性解析”的层面。“日本学”作为中国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可以说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发展之中。

—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知日本的国家。从公元前3世纪左右《山海经》中开始报道日本列岛原居住民(Proto-Japanese)以来,两千五百年间积累着极为丰厚的关于日本的资料。

就文化层面而言,日本与世界的联系,最早就是以与中国之间相互传递经济、政治和文化情报信息作为起点的,中国是向日本列岛输送了最大数量文化的国家。依据《宋书》,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接受日本文化的国家。公元8世纪左右,在《万叶集》编纂之前,当时的日本使臣和留学生,已经在中国创作“和歌”了,中国的唐代诗人是世界上最早接触“みそひともじ”这种文

4 东亚文明：共振与更生

学形式的外国文学家。这当然也是日本在世界上最早发生的“文学外交”。12世纪，“假名词组”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文献中记载了汉语与日语“词汇发音”的对照。例如，汉语中人体的“口”，日本语称为“窟底(kudi)/Kuchi(くち)；汉语中人体的“头(tou)”，日本语称为“加是罗(jiashiluo)/Kashira(かしら)；汉语中人体的“耳(er)”，日本语称为“弥弥(mimi)/Mimi(みみ)”等等。尽管掌握的“词汇对照”不多，但无疑这是世界上在日本海外关于日本语词汇发音的最早记载。14世纪，“假名四十七音图”已经完整地传入中国，表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专门的日本语语言学家了。16世纪，中国出现了“和歌”的汉文译文，保存至今的大约有八十余首。毫无疑问，这是“和歌”，也是日本文学作品最早的相对完整的海外译本。18世纪时代，日本的一些汉学家如荻笙徂徕(Ogyu-Sorai)等，他们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有相当的流传，有的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甚至还出现了像《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先生运用“假名词组”写作戏剧文本这样的盛举。

东亚文化史以极为丰富的事实告知我们，自上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关注，一直立于世界的最前列。这种文化关系，组成为“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的基本构架。

但是，由于极为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如此丰富的感知，却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构成一门完整的学科。即使到了近代，在中国近代文化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尽管中国新文化中的不少学者已经在非常广泛的层面中，介绍、评价和接受了日本文化，但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还没有能够把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研讨，组织成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观念和方法论系统的学术。缺少了对它进行真正的“理性解析”，因而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它的“实像”。比如三十年前，在一些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中流行过的所谓“日本儒学资本主义论”的“虚影”，实在是非常遗憾。

近三十余年来，这样的状态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人文学术广泛而又深刻的发展中，中国学者把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经验感知”，已经在多层面中提升并发展为“理性解析”。一门具有近代人文学术本质特征的“日本学”学科已经建成，并正在发展之中。

二

那么,中国的“日本学”的基本内涵,具有哪些最基本的范畴呢?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究竟在哪些层面中,把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长期积累的“经验感知”提升为“理性解析”呢?

依据我个人三十多年来的体验,以及我对于周遭许多同事正在进行“日本研究”的业绩的体认,我个人以为,构成中国形态的“日本学”,至少已经具有了以下三个基本的学术范畴。

第一,致力于把握“日本文化”的哲学本质。所谓“日本文化的哲学本质”,指的是“Yamato”在前近代作为一个族群,在近代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所具有的“宇宙观念”、“世界观念”、“信仰观念”、“生死观念”和“人生观念”等等这样一些属于精神性的本质形态。长期以来,包括一些日本学者在内,认为近代之前的日本人是没有哲学的。比如,著名的中江兆民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日本人是没有哲学的,没有哲学的民族是痛苦的。这个观念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以至于学术界常常把 20 世纪初期西田幾多郎(Nishida-Kitarou, 1870—1945)的《善的研究》评价为“日本哲学”的第一次表述。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逐步地意识到,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像“日本”这样一个族群,能够在一千五百余年间从未中断过自身的历史发展,并且不断地推进和创造着自身的文明,与世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那么,它的文化内涵必定存在着作为民族发展的精神基础——这就是我们说的“哲学精神”。

世界文明史研究提供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真正理解与把握作为民族文化基础的“哲学精神”,那么,研究者就很难能够真正地理解那个民族文化的“实像”。当然,世界文明史的事实也昭示我们,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哲学精神”的表达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古希腊人使用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来表述他们对宇宙、世界以及人生终极的思考;中国汉族人习惯于在阐述人性、人文、伦理之中来表述对世界的基本观念。自古以来,“Yamato”民族与希腊人和中国汉族人在精神本质的表述上,形态是很不相同的。他

们不是依靠专门性的所谓“哲学著作”，而是在文化多形态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中透露出自身的“哲学精神”。

基于这样的基本认知，中国学者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研究，正在从“表象的表述”，逐步推进到对“日本国民的精神信仰特征”的研究，推进到对“日本国民的美意识特征”的研究，推进到对“日本国民在特定的时空中面对自己的生存利益和突然事变所表现出的精神形态和行为模式”的研究，从而来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的精神本质。通过这些研究，可以说中国的“日本学学术”正在逐步地摸索和把握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中形成的日本民族文化内部所具有的基本哲学内涵以及它们的本质意义。从而为中国学者进入“日本学”领域，观察各个层面的研究课题，提供了相对来说愈来愈具有接近本相的理性引导。

第二，作为中国“日本学”学术第二层面的基本学术范畴，则是我们正致力于在“世界文明”的总体进程中解析日本文化内在的构成机制。即十分注意日本作为一个偏居亚洲东部海域中的一个地域并不广大的国家，它在自身发展中，在不同“时空”中它与世界文明的各种联络，以及这些联络的“内在运作”对构成“日本文化”、“日本文明”的价值意义。

一般说来，日本从“中世”以来，如同 14 世纪《神皇正统记》所表述的那样，开始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发展起了所谓“神国”的观念。江户时期“国学”的形成与发展，在某种层面上，应该认定它具有“民族文化觉醒”的价值。但由于它与“神国”观念的意识形态相互呼应，紧密地粘合在一起，从而把对“日本文化”的阐释引向了脱离世界文明发展本质的“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绝对主义”。把“日本文化”的发生，阐释成为它完全是“日本本土”产生的“纯粹的日本产品”。并且，似乎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也只有“日本人”才可能享受消费。“日本文化”成为了一种“高纯粹”的“日本民族奢侈品”，从而遮蔽了“日本文化内在构成的本相”。其实际后果，则是把“日本文化”解释为一种脱离“世界文明总体语境”，特别是脱离“东亚文化语境”而生成的“文化孤儿”。这实在是很不幸的。

毋庸讳言，这种“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的“价值观念”，一直到当代，在日本学术界的局部层面中，仍然以“非常近代性的”形式表现出

来。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有些学者创导的“海洋的日本文明论”,把“日本文化”与“日本文明”阐释为在与“亚洲大陆文化”的“分离与对抗”中得以形成与发展,其中就暗含着相当深厚的关于“日本文化发生”的“绝对主义”和“孤立主义”精神倾向。我坦率地说,这样的文化思潮,不仅会误导日本国民,而且对中国从事“日本”和“日本文化”研究的某些学者而言,在他们缺乏科学的文化理论的状态中,误导了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其实 1500 多年来,在各个特定时空中发生与发展的日本文化,它的内部始终具有与“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并强有力地吸收其中有价值的成分,从而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材料。日本文化从来就不是“孤独的文化”,它与世界文明的总体进程是连接在一起的,它的文化内部具有活跃的能动的运行机制。

自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日本”和“日本文化”研究者,以“跨文化观念”为基础的“文化发生学”为依托,在若干层面中对“日本文化”——比如以“日本文学研究”为例,从上古时代的“记纪神话”一直到当代诺贝尔文学奖的创作中,以经典作品作为对象,解析出它们以自身的哲学本体为基础,内含着极为丰厚的“异质文化”材料,从而在相对深入的层面中揭示了日本文化内在的运行机制,展示了它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使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获得了相对真实的原典文本,提供了阐述表达的文本基础。

第三,作为中国的“日本学”学术之第三层面的基本学术范畴,则是我们正致力于把握日本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所提供的积极的价值。即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不仅仅注重日本文化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吸收和融合,而且也注意到作为亚洲东部国家,它的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当然包括它对于中华文化发展所提供的价值意义。

中外学术界关于“文化移动”的论说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化的移动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从“大文化区域”向周边的“弱小文化区域”移动。这一论说由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文明形态史观”中加以强调,从而为不少的研究者所接受,也直

接影响到中国一些学者对日本文化的价值评定。

事实上，我们在对世界文化史的观察中可以感知，世界各族群、各民族的文化移动的实际状态，比这些“学术定义”要复杂得多。欧美近代文化的形成，其中就有世界其他地区“弱小文化”提供的养分在内。当代中国学者在推进“日本学”的研究中，十分留意自古以来日本文化在东亚和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它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我们在本题的开始已经讲到，假名的西传、和歌的西传，推进了中华古代语言学、翻译学的发生和发展。就以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小文学现象来说，古代中国汉族文人在因为冤屈而死的时候，常常会写作“绝命诗”。其中从10世纪以来，有一个“绝命诗”写作系统。这种诗由四组イメジ组成，表达气氛悲绝、孤魂无依的凄凉。这种“绝命诗歌”，甚至在《水浒传》中也出现过。清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是被处死的，有人伪托他的名字为他写了一首这一类型的“绝命诗”。其实，这一系统的“绝命诗”，都是受到7世纪日本大津皇子的诗歌而形成的。这当然只是一个细微而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若从更大的文化层面上考量，可以说，日本文化对于中华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以上三个“日本学”范畴的总体观念，就是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立足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中，把“日本”与“日本文化”作为“世界总体文明”的一个“类型”进行考察和阐述。运用我们积累的总体性智慧，把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认知，从仅仅依靠“经验感悟”中改造为以“学术理性”精神，逐步解析和把握“日本”和“日本文化”的多层面的“实像”。从而使中国“日本学”成为世界对“日本认知”的一个有价值的层面，同时也提升中日两国在把握“文化真相”的层面中的相互认知和对世界文明的理解。

三

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学科创建中建立起了“日本学”。作为逐步走向成熟的“日本学研究”，我相信，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形成有意义的、并且可能是具有内在系统性特征的“学术观念”。这一系列的“学术观念”，引导研究者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观察具备了“学术理性”。

这一具有内在系统的“学术观念”，我认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研究者逐步建立起了“日本文化”的“变异性”概念。

什么是关于“日本文化”的“变异性”概念？这里指的是，当我们在世界文明总体进程中考察“日本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感知，日本文化的各种样式，其实都已经从最古老的“原发性文明”的承传中脱出——从“记纪神话”到当代文化，它们其实都是在“特定时空”中与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外来文明在不同层面上组合成的各种“新文化”形态。

这是观察“日本文化”的基本观念，同时也是观察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观念。包括“中华文化”在内，所有的“文化”都是“动态的文化”，“静止的文化”只是相对的。这就是说，真正的文化学研究者是不相信“文化的纯粹性”的。完全依赖于“原发性时代”的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存在的。

第二，研究者逐步建立起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日本文化“内部组合”的概念。

所谓“文化变异性”，指的就是民族文化以自身的哲学精神为本体，在多元文化语境中造就新的文化样式。因此，文化研究的责任，就在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化的内部组合。在这里，“还原”指的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解析出构成文化整体样式的内在的各种元素。

依据我们对于日本文化经典文本的解析，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自上古以来的日本文化内部各种元素，至少是由三个层面的“文化语境”组合而成的。就是本民族的文化语境、异民族透入的文化语境和在特定时空中人类认知的共性文化语境所共同组合。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本民族的文化语境”，它指的是这个民族的历史承传中有价值的文化成分，也指这一文化产生时代特定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比如，我们考察“记纪神话”开始的一段，即イザナキ和イザナミ创造“大八岛”的故事。神话展示的宇宙，只有“高天原”和“天神”的存在，二神完成了创生“大八岛”即“日本”的国土。几乎与世界所有神话不同，它们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神的后裔。即日本的国土，是具有“生命的活体”。创始神话的这两个情节强烈地透露出日本民族文化语境的特征。

所谓“异民族透入的文化语境”，指的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时所获得